



左:《文史哲》1962年第1期,封面上的“文史”两字是从鲁迅手稿中挑选并放大。右:《文史哲》编委会在工作

4月21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山东大学考察工作,走进了《文史哲》杂志编辑部。李克强翻看了纸张已经泛黄的《文史哲》创刊号,了解了《文史哲》的各方面情况,希望《文史哲》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,为当今所用,为后世续航。六十多年来,《文史哲》走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家,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《文史哲》走出的学术大家

发掘美学大师 掀起“红色”波澜

张九龙

独占“三朵金花” 名家竞相争鸣

《文史哲》是一份应时而生的学术刊物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学术刊物寥寥无几。当时的山东大学已经以文史见长,在副校长陆侃如、历史系主任杨向奎等人的倡议下,尽快创办人文学术刊物成为文学系、历史系教师的共识,也得到了校长华岗的支持。《文史哲》的办刊宗旨是“繁荣学术,提倡争鸣,奖掖青年学者”,但是又限于此。华岗想通过《文史哲》打破旧有、单一的学术模式,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学术范式。

这种突破率先从《文史哲》创刊后的史学大讨论开始。1951年7月,童书业发表《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》,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,对“战国封建论”、“魏晋封建论”等提出挑战。古史分期问题,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,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。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、吴大琨、赵俎生以外,郭沫若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侯外庐、何兹全、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,加入论战,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种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共有五次,分别是中国古史分期、农民战争史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中国历代土地制度、汉民族的形成,被称为“五朵金花”,其中前三次均由《文史哲》领衔发起。

可以说,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《文史哲》几乎成了人文学科,特别是历史学科的最高学术殿堂,发表了一大批名家名篇、经典力作,影响着学术走向。《文史哲》上刊发的这些论文,奠定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,也成就了杨向奎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的学术地位,实现了对知识分子传统世界观、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化改造。正如季羨林后来曾盛赞《文史哲》:“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,有一登龙门之感。”

维护学术尊严 走出美学大师

据《文史哲》首名专职编辑葛懋春回忆,一次他和杨向奎去华岗家汇报工作,华岗提出一个编辑原则: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。

一批学术新秀由此登台亮相,比较典型的当数李泽厚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哲学家,李泽厚以美学闻名,而他的学术起点正是《文史哲》。1955年2月号《文史哲》上,刊发了一篇《论康有为的〈大同书〉》,文章认为《大同书》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,是进步的,引发了广泛关注。

这是李泽厚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,当时他才25岁,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不久,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,在学术界默默无闻。文章发表后,有国外学者给他来信,以为他是著名的教授,却没想到他竟这么年轻。“上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去,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,因为估计在《文史哲》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。”李泽厚回忆。

而在著名学者庞朴眼里,《文史哲》

守原则、有风骨,让他终生难忘。庞朴主要研究领域是儒家思想,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,被下放到曲阜。接受改造之余,庞朴并没有就此沉沦,而是继续坚守学术。1974年1月的《文史哲》上刊发了庞朴的《孔府地租剥削内幕》一文。这篇文章在庞朴一生学术成果中微不足道,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2001年5月,庞朴应邀参加山东大学纪念《文史哲》创刊50周年庆祝活动,他在会上说:“当时我的‘政治状况’很不好,这个情况《文史哲》当然知道,别的地方也知道,因此我的有些文章在别的地方不能发表,而就是在1974年那样的时候,我的一篇文章居然在《文史哲》上发表了。过后,吴富恒校长还跟我说:你不错,好好写。当时我非常感动,且不说别的地方能否发表文章,就连我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,《文史哲》居然发表了我的文章。”

鼓励向权威挑战 掀起“红学”波澜

《文史哲》真正走向鼎盛,是因为两个“小人物”:李希凡和蓝翎。1954年,《文史哲》刊发了两人的文章《关于〈红楼梦简论〉及其它》。李希凡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当时大学刚毕业,才26岁,而蓝翎则是一名只有23岁的中学教师。

在这篇文章中,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入红学研究,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《新建设》杂志上的《红楼梦简论》。他认为俞平伯“未能从现实的原则去探讨《红楼梦》鲜明的反封建倾向”,“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,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”。

俞平伯是与胡适并称“新红学派”的创始人,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权威。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对俞平伯的观点有不同意见,但发表过程并不顺畅。他们起初写信给《文艺报》,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,被置之不理。随后,他们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,终于获得了支持,《文史哲》刊发了他们的作品。

借着《文史哲》的影响力,李、蓝的文章迅速传播,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。在毛泽东看来,这篇文章是“三十多年来向所谓《红楼梦》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”。1954年10月16日,毛泽东专门写下《关于〈红楼梦〉研究问题的信》,赞扬了李、蓝“两个小人物”。这封信还掀起了对俞平伯、胡适的批判,在1954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的中国学术文化界,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波澜。

事实上,早在1952年,《文史哲》就陆续发表了陆侃如《纪念五四,批判胡适》等文章,从1952年至1954年,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6篇之多。现在看起来,李、蓝那篇文章不过是《文史哲》敢为天下先、勇于挑战权威的众多文章之一。

从此,《文史哲》名声大噪,走向鼎盛。1955年至1956年,被作为国家代表图书,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、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、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。哈佛大学更将《文史哲》杂志与《历史研究》、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列为所认可的四大中国大陆人文学术期刊。

中兴煤矿的两次工人大罢工

王功彬

枣庄,是山东近代工业发端的三个基地之一,也是山东第一批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。自1878年枣庄中兴矿局开办后,普通矿工始终被牢牢束缚在封建把头制度的桎梏之下,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都非常低下。矿工们不堪忍受中兴公司把头们的压榨和盘剥,纷纷自发开展反抗和斗争,继而在1932年、1933年举行了两次波澜壮阔的工人大罢工。

中兴公司把工人分成“里工”和“外工”(据山东实业厅1931年1月调查,里工2081人,外工5384人)。“里工”由公司直接聘用,工资按月发放,待遇优厚。“外工”即外包工,由包工头雇用和结算工资。包工头对“外工”的剥削和压榨非常残酷,甚至毫无顾忌。他们的工作时间由1928年的每天十小时,至1931年时已增加到十一个半小时。生活更是惨不忍睹:吃烂豆饼,穿麻袋片,住“窑户铺”,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,病无所依,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“窑户铺”的房子低矮、潮湿、破烂,夏不防热,冬难避寒,里面蚊虫、虱子、臭虫、跳蚤成堆,各种传染病随处流行,卫生环境极为恶劣。据中兴煤矿公司鞠仁医院统计,工人们的患病率达70%以上。

中兴公司对“里工”和“外工”的待遇更是天壤之别。公司内资方代表人物和高级职员(如经理、矿师等)的住宅,都建造得非常豪华,把头、监工的住宅也相当壮观,他们的生活是“鱼一盆,肉一碗,姑娘一串。闲着没事打麻将,闷展愁肠抽大烟”。德籍矿师克里柯的工资(包括年终“花红”),每月平均收入竟达三千元之多,是普通矿工的四百多倍!

公司建立初期,很多技术仍沿用百年土法,劳动条件相当恶劣,冒顶、透水、瓦斯等事故频发。加之后聘请的德籍总矿师高夫曼“原系五金矿师,于煤矿毫无历练”,对矿难预兆毫无经验,结果导致1915年2月1日发生特大瓦斯透水事故发生,致井下673名矿工有458人遇难。灾难发生后,工人家属和居民纷纷涌向矿里,“护矿队”(后改称“矿警队”)不仅不让群众进入,反而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镇压,死伤多人。

矿工们不堪忍受中兴公司把头们的压榨和盘剥,纷纷自发开展反抗和斗争。他们进行了消极怠工、暗中逃跑,破坏设备、暗杀工头等活动。

1920年11月21日,中国的第一个产业工会——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。1923年11月,中共中央专门对枣庄工运高度关注,曾明确指出“山东坊子、淄川、峄县等地的矿工运动,山东省同志应把它和津浦、胶济路工人运动同时并重……”1926年7月成立枣庄矿区党支部,纪子瑞任书记。1928年初,中共党员张福林又在枣庄组织了“枣庄煤矿失业工人办事处”,同年7月成立了“失业工会”(即“外工会”)。

看到“外工会”不断地发展壮大,中兴煤矿公司开始了对他们的排挤和打压。1928年8月5日,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周学昌以召集会议答复条件为名,派矿警队在会场上逮捕了张福林、蒋福义、郭长清、王文彬等四位工会领导人,并宣布解散“外工会”。

1929年3月4日,在中兴公司台儿庄火车站的抬煤工人,因不堪忍受重体力低收入的待遇,自发集结,举行了首次大罢工,最终资本家妥协,增加了工资和福利。此举传至枣庄,对后来的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1932年夏天,中兴煤矿公司因没给“外工”发放红利,引起矿工愤怒,枣庄特支抓住这个机会,决定在6月13日上午八点在十里泉召开群众大会,部署大罢工。消息走漏后被军警拦截,后决定于19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。当会议进行到高潮时,被军警冲散,后田位东、郑乃序被军警抓捕,于8月初二人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。枣庄煤矿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宣告失败,“外工会”也遭重创,骨干被捕,积极分子解雇。为强化对工人的统治,资本家又加大监督力度,韩复榘也派一个团兵力驻枣,以缉匪为名,对工人施压。

对此,山东省委、徐州特委分别派张宏翼和吴季谏来枣恢复党的工作,后来徐州特委又派郭子化来枣,开设“同春堂”药店,以行医作掩护,成立矿区党组织,开展地下工作。经半年的组织发动,矿区党组织决定利用中兴资本家“花红”只分“里工”不分“外工”造成与工人的矛盾,在1933年五一前后发动大罢工。大会在枣庄城西二十里的中陈郝村召开。资本家得知后,摆宴席,施小惠,收买引诱工人代表,被拒绝后仍不答复工人们的要求。党组织决定改在龙头集会,继续罢工。中兴公司便派兵包围会场,绑走工人代表,欲押往济南。工人们闻听异常气愤,纷纷涌向火车站,堵铁路,砸车头,最终将工人代表救出。鉴于群情激奋,中兴公司惧怕这强大的工人威力,只好答应每人每月发半吨火炭。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。